

# 创意产业集群运营模式国际比较分析

——以上海和伦敦为例

田 媛,高长春

(东华大学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0051)

**摘 要:**选择属于潜在集群和政策导向集群集合体的上海创意园区和属于工作集群的伦敦艺术工作室作为比较对象,创意园区和艺术工作室分别是上海和伦敦创意集聚的主要表现形式,通过对两个城市创意集群所有权、公共服务、融资方式和管理体系的比较,分析上海与伦敦城市创意集群在运营模式上存在的差异,并对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最后结合本土文化和经济模式,提出上海创意集群发展建议。

**关键词:**创意集群;创意园区;艺术工作室;运营模式

**DOI:**10.3969/j.issn.1001-7348.2012.06.008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2)06-0031-05

## 0 前言

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对不同国家文化、创意和当地经济发展模式之间作用关系的讨论<sup>[1]</sup>。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两部分:①对同一个国家不同城市集群的比较<sup>[2-3]</sup>;②对不同国家城市创意产业集群的比较<sup>[4]</sup>。梳理创意集群对比研究的文献可知,大量的对比研究是对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创意集聚发展问题<sup>[5-6]</sup>。仅有少数学者对不发达国家创意产业对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进行了研究<sup>[7]</sup>。很多学者都对集群进行了定义<sup>[8-10]</sup>,但最具影响力的是 Michael Porter<sup>[11]</sup>对集群作出的定义:“在某一个特定区域互相关联的企业或机构在地理位置上的集聚,并且在此区域人们可以在不寻常的竞争关系中取得成功。”结合这些定义,集聚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地理集聚,企业之间相互关联,以文化和创新为基础的高度专业化企业,信息流动性强和风险转移等。商业集群、文化集群和创意集群是集群的主要表现形式,创意集群与其它集群不同的是创意集群拥有灵活的组织形式和更高的员工流失率。

学者们对于不同国家创意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创意产业空间格局的不同<sup>[4]</sup>;不同国家创意产业发展的潜在约束<sup>[12]</sup>;创意产业在不同城市的驱动力作用和发展流程<sup>[8]</sup>。本文从另一个角度研

究不同城市创意集聚的运营模式,以伦敦为参考对象对运营模式、管理体系和融资模式进行比较,探究上海创意集聚发展与伦敦创意集聚的差距和不同。

## 1 基于文化资源多元化自主发展的伦敦创意集群

伦敦是世界上最富有创意和文化底蕴的城市之一,这座城市拥有 300 多个世界级的博物馆和艺术画廊,蕴育了浓厚的历史氛围以及大规模、多种类的艺术生活。2005 年伦敦的创意产业产值为 569 亿英镑,有 1 045 400 人从事创意产业工作,通过发展创意产业,伦敦成功从金融服务产业城市转变为充满活力和青春的创意城市<sup>[13]</sup>。因此,伦敦的创意产业发展很具代表性。在英国有大量自然形成的产业集群,集群里的公司由于地理位置的毗邻可互相依赖产生协同作用,例如,伦敦的 SOHO(电影/媒体和音乐的后期制作)和伦敦的东岸(艺术设计)。

### 1.1 伦敦艺术工作室组织

艺术是伦敦创意产业发展不可忽略的领域,工作室在艺术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工作室”是为有需要的艺术家提供工作或练习场所,并能被艺术家负担得起的空间。在工作室艺术家可以做各种创作,例如,艺术展览,电影或音乐录制等。自

收稿日期:2011-12-0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873018)

作者简介:田媛(1984—),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华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意产业集群、创意城市竞争力、创意产业投融资;高长春(1964—),男,吉林桦甸人,东华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创意产业、战略管理。

1960年起,艺术家们占领了伦敦东部和东南部前身为工业或其它用处的建筑,并用作工作室,现在伦敦的东部和东南部已经演变成世界上最大和最持久的视觉艺术社区<sup>[14]</sup>。艺术家们将这些建筑物转化成艺术工作室,此后一系列的工作室组织出现在伦敦,这些组织是伦敦创意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被认为是伦敦乃至英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艺术工作室组织分为4种类型:工作室提供者(正式的公司形式),工作室组(非正式的公司制),商业经营者和地方当局工作室提供者。这些组织在拥有建筑物的数量上是大大不相同的,其中一些工作室组织紧紧拥有一幢楼。例如,APT,Cubitt,Gasworks和Occupation Studios都是单一大楼组织者。还有一大部分,例如,ACAVA,Acme Studios,ASC,Chocolate factory和SPACE都是拥有多个大楼的组织者,并为数以百计的艺术家提供工作室。由于工作室的前身大都不相同,因此这些工作室在规模、结构和工作方式上大不相同。截至2008年,英国共有147个工作室组织和超过250栋工作室大楼,为超过6000名艺术家提供工作室。伦敦拥有的工作室数量超过整个英格兰的其它地区,伦敦拥有31个工作室组织,管理89栋工作室大厦,为超过2500名艺术家提供工作空间<sup>[15]</sup>。由于需求较高,不是每位艺术家都能够获得工作室,工作室几乎百分之百被持续占有,每年仅有7%的换手率。

### 1.2 工作室融资渠道的多样性

伦敦工作室的租金是英国最贵的,2004年达到每平方英尺7.54英镑,2007年租金上涨到每平方英尺8.5英镑<sup>[14]</sup>。伦敦拥有3个主要的艺术公共基金:劳埃德艺术团,英格兰艺术委员会资助和艺术资产项目,但是工作室的大部分原始创建成本都来自于所有者而非公共基金资源,2003—2004年获得政府支持为25万英镑<sup>[16]</sup>。企业慈善救济金是工作室的另一个主要的资金来源,资助比率与政府资助相当,86%的被救助者接受企业慈善救济金的强制资助或酌情资助,或是两者都有,14%的资助者没有慈善救济金<sup>[14]</sup>。慈善组织身份非常有利于获得资金资助。因为,它能够获得公共基金和税收减免福利,伦敦70%的工作室团队都是慈善机构,依靠大量的志愿者员工和艺术家租户对工作室大厦进行管理,节省相应的费用。工作室团体的身份中还包括: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教育慈善机构,慈善基金和社会公积金。这其中仅有少数工作室团体和慈善机构身份没有关联。

### 1.3 公众与集聚区的互动关系网

Scott<sup>[17]</sup>指出文化产业集群的存货和发展通常依靠多种发展模式,需要更多正式的和相关机构的支持与关注。例如,公司合作伙伴关系,媒体发展机构,培训组织,专业组织和出口推广组织。为了给工作室营造良好的发展空间,造福于公众和艺术家,超过50%的工

作室大楼不仅为艺术家提供可承受的工作室,同时也为公众提供服务,包括各种公共展览、教育工作坊和涉及不同社区的推广方案。如同我国一样,它们同样和大学进行合作,例如,提供会展空间和教育项目,帮助年轻的艺术家开始他们的事业。这些行为增加了工作室的知名度,充分利用外部与内部资源使工作室更容易获得社会基金。除此之外,艺术工作组/大楼和基金或商业公司合作,并提供相关的项目和培训课程。例如,Acme在近些年与不确定商业地产市场的联盟,对于雇员的持续需求给予Acme与商业和社会房屋建筑商开拓发展伙伴关系的机会,构建混合使用发展且永久实惠的工作室。SPACE伦敦工作室的顶级供应商,为艺术家和市民提供大量项目和培训课程,例如,展览、合作、媒体艺术课程、地址培训和城市移动电视等。与此同时,工作室管理者也帮助租户共享信息,寻找与其他租户的结合点,进而获得基金支持。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伦敦的发展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每一个工作室都有基于自身特点考虑的独特发展模式,管理体系和资金渠道。艺术工作室作为创意产业集群的分子,对于创意产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前面的分析反映出伦敦创意产业的3个发展特征:①由艺术家们自发创建的艺术工作室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转变成有组织艺术大厦,这种自然转变过程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②通过为公众提供培训项目和空间,工作室与外界进行良好的互动,同时吸引了多种资金支持,扩大了工作室组的知名度;③工作室的多种经营身份和经营形式降低了发展风险,迎合了艺术家们的多种需求,并以此来支持当代艺术的实践发展。工作室组织在关注当地文化的同时,更加注重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协调,帮助企业之间建立起内部网络关系,从而达到信息共享,节约成本和增加收益的目的。

## 2 基于产业优势政府导向的上海创意集群

创意产业首先出现在我国是2004年末,“太平洋研究所”在2004年6月首次提出“创意经济”这一概念。上海是我国第一个引进集群概念的城市,并将此作为老城区再生的关键要素。作为长江三角洲的领跑者,又是我国最大的经济、金融中心和口岸城市,凭借上海特有的“海派文化”和高度国际化,这些优势促使上海创意产业的发展也在国内处于佼佼者的地位。根据上海创意产业协会的数据,上海2009年的建筑设计产业增长比率为18.9%,研发产业的增长比率为23.6%。2009年底,上海拥有80个创意集群区,总产值达到4.22亿元,与2008年相比增长了84%。和伦敦拥有的大批自然集聚群不同,上海的创意集群区是在政府引导下建立的,例如,田子坊,M50和8号桥。

### 2.1 城市格局引导产业集群

上海创意产业发展不是以工作室为发展单位,而

是以创意园区为发展单位。由于文化资源、经济状况和产业布局的不同,上海18区结合自身的优势,纷纷开始了创意产业的发展,并拥有各自的优势产业。例如,杨浦区以建筑设计产业著名,徐汇区则是专注于软件信息的研发,长宁区以服装和时尚产业作为发展的目标<sup>[18]</sup>。由于经济发展的水平与欧美国家存在差异,产业结构和文化背景的不同,特别是产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不同,上海将创意产业分为4个主要的发展方向。

结合这些发展方向,上海现在拥有82个创意产业集群区,这些集群区由上海市经委进行统一管理与授牌,其中徐汇区、长宁区和虹口区分别以13、12和11个园区名列前三位。上海市经委支持建立了非盈利创意产业发展促进组织,上海创意产业中心和上海创意产业协会,帮助创意产业建立产业平台,促进创意产业更好的发展。迄今为止,上海创意产业集群区的建筑面积为2.7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国外30多个国家超过1.2万人来为6110租户进行服务<sup>[19]</sup>。

以上区域的创意产业集群区依据集群的形式和初始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3类:①依靠高校而形成的创意产业集群,所占比例为17.3%,凭借学校的溢出效益进行产学研的有效结合;②旧工厂和库房的翻新而成。这一类型的比例高达72.4%,过时产业的遗留是城市的财富,政府为了保护这些遗迹和当地的艺术家的共同对于这些废旧工厂与库房进行创意翻新,吸引更多知名公司入驻,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③开辟新的区域,建筑全新的集群区。为了平衡各区域的发展,政府选择具有投资潜力的区域,建立创意产业集群区,并定义这些集群区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引擎,如前文提到的张江高科就是很好的例子。

## 2.2 政府与高校双管齐下拉动创意集群发展

高校在上海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领导者的角色<sup>[20]</sup>。依托高校的知识溢出效应和全方位定向技术链对相关产业的强大辐射功效,高校为企业输出最新研究成果,培养创新人才和提供专业培训项目。创意集群周围的大多数企业的员工都是高校学生或老师,并且这些企业的规模都较小。例如,同济建筑设计创意产业集群区中80%的创业企业人员是同济大学的老师和学生。此外,这里集聚了大约500个企业,仅有1万人在这里进行工作,这意味着每个公司的员工少于20人<sup>[21]</sup>。

在组建和整改创意园区的过程中,政府为了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开拓发展空间,制定相关政策对创意产业的发展予以扶持。这些政策主要关注以下方面:①创意产业发展的金融环境。文化部出台《文化产业投资目录》(2009年)和文化部、中国银行等9部委联合颁布《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2010年);②创意产业整体发展战略。国务院颁

布《创意产业振兴计划》(2009年)和《十一五规划》(2006年)。在政府的推动下,各个城市都积极地发展创意产业,上海下一个五年规划(2008—2012年)的首要社会经济目标任务是加速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大力扶持创意产业和其它服务性产业。

高校为创意集群区提供人才、技术和孵化器等内在因素,保证创意集群区的内部良好运作,政府通过法律和优惠福利政策为创意集群区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维护创意人才的利益,营造宽容和谐的发展氛围,两者从创意产业的内部与外部联合出手,为创意产业的发展铺路,促使创意产业向更科学、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 2.3 创意园区融资渠道单一

我国创意产业集群区的主要资金来源于政府鼓励社会投资和财政支持。例如,8号桥的政府和社会投资共计4千万人民币,同乐坊开发成本将近1亿元人民币,1933创意园区的开发成本也超过1亿元人民币<sup>[22]</sup>。除了国有的创意产业园区外,还有一定比例个人开发的创意产业园区和创意工作室。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建筑师登琨艳对1930年废弃的坐落在苏州河畔的老厂房的改造,由于登琨艳和一些艺术家的共同努力,现在苏州河畔已经成为中国的塞纳河左岸,这里有将近100位艺术家的工作室。大多数私人创意工作室的资金来源都是来自艺术家自身,依靠他们自身的生意——租金收入和艺术品的销售。上海的艺术工作室租金上涨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创意产业的发展,创意集群区的内外部设施与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改善,集群区知名度的提升,吸引了更多企业入住,再就是周围物业成本的上涨,致使集群区内的房租上涨速度较快。例如,M50是以艺术家和画家集聚著名的创意园区,2000年的租金为0.4元/平方米/天,到2008年租金已经为4元/平方米/天。

## 3 上海与伦敦集群特征比较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伦敦的创意集群区是从文化集群区演变而来,上海创意集群是从商业集群区演变而来的。

### 3.1 两城市集群发展阶段和目标的差异

伦敦开始发展创意产业时,已经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极的转变过程。上海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但工业依旧是主要的经济增长极。因此,在形成产业集群区时运营模式自然不相同。正因为两城市所处经济环境的不同,也令两城市发展创意产业的目标有所不同。上海希望通过发展创意产业集群区来完成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利用外国企业的资源和信息来完成经济机构转型的最终目标。伦敦发展创意产业的目的则是支持文化和艺术的延续与发展,创造更多

的就业机会,同时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带动经济的增长。

### 3.2 上海集群缺乏外部互动协作性和灵活性

根据奈特<sup>[23]</sup>对集群的分类,伦敦属于工作群,主要体现在与本土企业的密集互动关系网络和复杂的合作与竞争模式上。上海创意园区内的入驻企业之间缺乏互动,园区内没有建立完善的互动平台为企业间寻找合作机会,同时在信息共享和促进企业的共同发展等方面都较伦敦欠缺很多。上海创意园区内缺少互动也就很难产生协同效应,所以将上海创意集群归为潜在集群和政策导向集群的集合体。伦敦的集群区是由艺术家自我摸索转变而成的,历经近70年形成了今日的局面,艺术家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发展方式进行变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集群区的经营模式如此多样化。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艺术家以自身的经历作为参考经验。因此,他们清楚在集群区内如何让企业之间更好的合作与互动,达到集群区的真正发展目的。这些集群区与外界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同时集群近些年也开始与商业机构进行合作,如与智囊团、职业培训机构和行业协会的合作,令集聚区更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价值,为入驻企业争取更多的资金与福利。慈善机构的注册身份,表明了集群的管理者以非盈利为目的,同时慈善机构身份帮助他们获得政府的资助与志愿者的帮助,以减轻他们经营集群区的负担。上海的创意产业集群主要由政府导向,这种发展模式降低了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并能借助政府的帮助获得相应产业的支持,政府的福利政策与资助加速了创意产业的发展。由于上海创意产业集群相对年轻,专业的自救机构(如商业咨询,市场策划和商品推广等)尚未开发完全,政府导向的发展模式在创意产业发展的初期可以克服这一弊端。但是政府统一规划发展的缺陷也随着创意产业的发展逐步显现出来,主要由于这种发展模式缺乏灵活性和多样性,且不利于创新思维的产生,同时也抑制了文化的发散性与辐射性。

### 3.3 两城市集聚区评价标准不同

两城市对于创意产业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存在明显的差异,伦敦集群区的评价标准为公共服务机构能否帮助入驻企业之间进行有效的关联,同时帮助它们获得社会资源,信息在集聚区内是否实现自由共享。此外,创新和互动是评判的另一个标准,园区内的艺术氛围与创新比率是标志着集群区品质的关键,集群区能否与外界进行系统且规范的互动,令入驻企业逐渐被社会大众所熟识,标致集聚区是否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与伦敦重视集群区内部活动不同,上海更加关注集群区入驻企业的知名度和入住率,用这些更加直观的比率来衡量园区的成功与否。这些园区看起来差别不大,缺少自身的特点,国际化是衡量一个园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这也使园区管理人员,

专注于吸引国际知名企业的入驻,而忽略了与本土文化的结合。

## 4 结论

与伦敦创意集群相比,上海创意集群略显稚嫩,创意区域必须通过知识积累、结合区域需求与市场的创新思维找到自己的救赎办法<sup>[24]</sup>。因此,上海创意产业集群需要考虑自己区域的特色、文化和市场的需求,借鉴外国的经验而不是抄袭来发展创意集群。上海创意集群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培育自主品牌,展现自身的特点,避免模型化发展。上海创意集群应积极开展各项公共活动并与相关企业机构进行互动。政府为创意集群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但政府应从直接管理者转变为第三方支持机构,从而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新创意的产生。

### 参考文献:

- [1] COOKE P, LAZZERETTI L. Creative cities, cultural clusters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8.
- [2] KEANE M. Created in china: the great new leap forward [M]. Routledge, Oxford, 2007.
- [3] KAI LIU. Creative edge of cit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op 500 creative industries businesse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J]. Creative Industries Journal, 2008, 1(3): 227-244.
- [4] LUCIANA LAZZERETTI, RAFAEL BOIX, FRANCESCO CAPONE. Do creative industries cluster? mapping creative local production systems in Italy and Spain[J]. Industry & Innovation, 2008, 15(5): 549-567.
- [5] RAMOS S JEYANTHI. Cross-cultural Studies of implicit theories of creativ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in ethnic groups in Singapore[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5.
- [6] CLIFTON N. The 'creative class' in the UK: an initial analysis[J]. Geografiska Annaler B, 2008, 90(1): 63-82.
- [7] HARABI NAJIB. Creative Industries: case studies from Arab countries[J].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May, 2009: 53-62.
- [8] STUART A. ROSENFELD. Bringing business clusters into the mainstrea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7, 5(1): 12-16.
- [9] HUMPHREY J, SCHMITZ H.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 [J]. Regional Studies, 2002, 36(9): 1 017-1 027.
- [10] ELSNER W. An industrial policy agenda 2000 and beyond: experience, theory and policy [M]. in: W. Elsner J. Groenewegen (eds.), Industrial Policies after 2000, Boston, Dordrecht [C]. London: Kluwer Acad. Publ., 411-86.
- [11] PORTER M. E.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 competition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 76: 77-90.

# 重庆市两江新区产业布局与劳动力聚合效应研究

刘苓玲, 李 培

(西南政法大学 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重庆 401120)

**摘 要:**比较分析了两江新区和滨海新区的功能区及产业布局,利用就业弹性系数模型对未来10年两江新区产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就业数量进行了预测。主要结论是:二、三产业的增长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了较强的聚合效应,第一产业产值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对就业增长产生了“挤出”效应。未来10年,两江新区将聚合劳动力137~142万人。据此,提出了两江新区的产业布局思路,以及发展、促进就业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两江新区;功能区;产业布局;劳动力聚合;就业促进

**DOI:**10.3969/j.issn.1001-7348.2012.06.009

**中图分类号:**F127.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2)06-0035-06

## 0 引言

随着20世纪80年代我国人员流动限制措施的松动和减少,地区不均衡的产业集聚程度也伴随着我国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而有所降低,我国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的主要特点是由相对贫穷的中西部地区向较为富庶的东部沿海地区转移。

2008年10月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致使我国的对外贸易遭受沉重打击(张小济等,2010)<sup>[1]</sup>,进而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实体经济产生冲击,部分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破产和倒闭状态。一部分内地农民工因失业、收入低而离开工地,出现了返乡回流现象。我国有2000万人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仅重庆就有20.4万人,占重庆市外出务工人员的43%<sup>[2]</sup>,占全国的1%。这次危

- [12] MICHAEL KEANE. Understanding the creative economy: a tale of two cities' clusters[J]. *Creative Industries Journal*, 2008, (3): 46-53.
- [13] CAROLINE CHAPAIN. Lisa de propriis, drivers and processes of creative industries in cities and regions[J]. *Creative Industries Journal*, 2009, 2(1): 32-40.
- [14] National federation of artists studio providers. 'artists' studio provision in the host boroughs; a review of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London's Olympic project [R]. 2010, London: NFASP, Dec.
- [15] Capital Studios-the London Artists' Studios Development Programme. 'Artists' studios: a guide to securing, supporting and creating affordable studios in London [R]. 2007, London: LASDP.
- [16] ACME. London digest a survey of artists' studio groups & organization in london from a national survey conducted by acme studios in 2004 [R]. 2006, London: Acme.
- [17] SCOTT A J.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ties: essays on the geography of image producing industries [M].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2000.
- [18] KEANE, M. Great adaptations, continuum, special issue on cultural adaptation [J]. *Creative Industries Journal*, 2009, 35 (3): 221-30.
- [19] 上海创意产业中心. 上海创意产业发展报告 [R]. 上海: 2009.
- [20] 褚劲风, 周灵雁. 地理学视野中的上海创意产业空间集聚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8(2): 200-205.
- [21] 范霞. 上海创意产业及其集聚发展研究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 [22] 鲁育宗. 上海创意产业发展报告 [J]. *上海经济*, 2005(3): 57-65.
- [23] ENRIGHT M. The globalization of competition and the localization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policies towards regional clustering, in N[A]. Hood and S Young, *Globalization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ctiv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 London: Macmillan, 2000.
- [24] COOKE P. SCHWARTZ D. *Creative regions: technology, culture and knowledge entrepreneurship* [M]. Routledge, London: 2007.

(责任编辑: 赵 可)

收稿日期: 2011-07-14

基金项目: 2010年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重点项目(2010XZYJS157)

作者简介: 刘苓玲(1971—),女,重庆人,博士,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管理;李培(1984—),男,河南永城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